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七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五期 ——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7d)

【各抒己见】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8201”——致余汝信先生 余言
【史实探微】1967年“武汉事件”——是谁透露了“四点指示”？ 诸葛壶口
【读史札记】读《微行》一书存疑 书生意气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各抒己见】

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8201”
——致余汝信先生

• 余言 •

近来，在网上读得朋友转来余汝信先生的《“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接着在南粤幸会先生，蒙赠大作，促膝交换对1967年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武汉军区29师的了解。在下觉得，以余先生熟悉、研究军队文革之长，该文向关心历史的人交代1967年武汉两支部队的来龙去脉，及其在“720事件”中的表现、作为，廓清一些文革以后含混不清的基本问题；军队有关史实的深入探讨研究，反思军队参加“三支两军”的成败，对科学地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无疑十分有益。

不过，对于独立师在“7·20事件”前后的具体言行，颇觉该文披露仍有所不足（先生手中的民间史料尚未使用）。现将足下所知一二，按时间顺序罗列一下，以供研讨之用。

◇ 据当年中央文革办事组到汉的张根成同志回忆，从中央领导来到东湖宾馆（7月14日），8201部队的领导同志，就表现不太高兴。“总理把8201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象不相信他们”。实际上周总理仅仅是把梅岭警卫换了（百花院的警卫是否

军区的，尚待弄清；不过谢富治和三军领导，多有自己随身警卫员和秘书），宾馆、门卫依然是原来 8 2 0 1 部队的警卫。蔡不知道毛泽东亲临武汉，出于他业已形成的对中央文革的意见，居然对周恩来亲自安排的警卫调换表现了不满。这已就后来出事埋下一枝伏笔。蔡作为鄂豫皖的老军人，不是不懂得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安排、指挥，况且长期做公安、内卫工作，相应的规矩总该明白。宾馆警卫也仅仅是部分调整，蔡看得过重了。思想上的抵触与压抑，应是首位的，除文革现实问题外，不知是否还有历史积怨？

◇ 武汉军区对宾馆保卫问题不是没有过考虑。在 7 月 1 5 日，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多项建议加强保卫，如调 8 1 9 9 人来；钟汉华政委一律不采纳，并说“8 1 9 9 部队与 8 2 0 1 部队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 8 1 9 9 好”。这是事件之后，军区组织揭发批判时披露的。后来，钟汉华政委在 1 1 月底的湖北省学习班全体人员大会上检查交待记录上也有同样的内容：“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 2 9 师的人进去。我说 2 9 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钟政委当然没有估计到在保卫问题上会出事，但他思想倾向于 8 2 0 1，与陈再道一样，对中央让刘丰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对警卫调换有意见。从钟的话里，看出当时军区同志斟酌过是否增加保卫兵力，派谁合适；其二，挑明两支部队有矛盾。这个矛盾，最可能就是指对武汉形势看法和支左问题有分歧。不过 8 1 9 9 部队未承担支左和城防任务，以前并未干预过 8 2 0 1 的行为，冲击事件中，也有少量 2 9 师人员自发参与。

◇ 7 月 1 6 日深夜，谢富治、王力一行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与他们的主要负责人交谈，劝戒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该联络站设在业已军管的 3 5 0 6 军需工厂，文革当中，除有后勤系统的军代表外，不知为什么还有 8 2 0 1 的支左军人（可能前者管支援越战的被服生产，后者管运动、军管），该厂是当时武斗的重要据点，有专职武斗队伍“雷达兵”。谢、王与百万雄师的接触，气氛很不融洽，据“百万雄师”内部传达，说接触时间总共只有 2 0 分钟，而且王力很不耐烦听百万雄师头头讲述。谢、王回去还严肃批评军区：联络站都设到军管的军工厂了。8 2 0 1 与“百万雄师”关系极为密切，二者本来就对中央文革满怀抵触情绪，这次谈话情况迅即汇报到独立师，增加了 8 2 0 1 领导对北京来人意向的了解和严重不满。

◇ 8 2 0 1 对王力的不满，早在 1 6、1 7 日已经公开表达出来。举一例：1 7 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 X X 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后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此说法很具代表性，且有口述史研究价值。当时王力还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戏剧性的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被一个营级干部翁某言中。（省劳改局造反派在事后有一个系统的调查报告，余先生可一读）可以补充的是，5 月以来，这种看法在武汉部队内散布较为普遍，认为当时中央的文革路线错了，依靠的是知识分子，而非工农兵。

◇ 1 8 日下午，周恩来在军区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传达了中央的意向。8 2 0 1 部队的蔡炳臣政委、牛怀龙师长参加了会议。蔡提出要求，经钟汉华同意，会议精神由蔡政委回去立即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周恩来讲话要点，是 8 2 0 1 部队有组织地传达的。（钟汉华的检查，也承认“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 2 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钟政委承担自己在事件里的失职责任，后来与王力也是相互谅解的，并不把责任往王力那儿推，所以去世前还嘱咐家人要给王力发讣告）蔡政委对中央的意见极不同意，他这样主动迅速传达，当然不是为了部队尽快知情转思想弯子。据 8 2 0 1 的干部后来揭发，蔡在传达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

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顿时会场吵吵嚷嚷，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意思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指向王力。王力水院讲话和在军区传达总理的四点指示，是蔡、牛在师部交代以后的事。

同时，蔡居然向8201师、团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不管思想认识怎样，牛、蔡如此讲话，毕竟与其师级领导的身份不符合。这些谣言从何而来，以后没有查，王力又跨了。

8201领导人对王力的传言，其实在王力到武汉前夕，已经在社会有所流传，从部队到“百万雄师”上层，已经有类似说法，王力到汉消息公开后，流言更为神奇了。和其他地方一样，武汉文革里许多重大事件，总穿插一些谣言。不能否认，这些谣言对推动、激励部分战士、群众，煽动一种社会舆论和情绪，有时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另外一例可以说明独立师当时对全国形势作过综合分析，对中央的文革方针很不满意。在7月19日，汉口8201军代表张XX对“百万雄师”的“革命工人三司”鼓动：“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样两条内容：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实际上，军区和独立师都通过各种场合，研究讨论了内蒙、成都军区和河南省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对这些军区的态度，对解决这些省、区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而且表示极不理解 and 极其不满。当时人们最担心的是武汉问题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导致军队和保守派前景凄凉。这些忧虑和担心，在武汉事件时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和谣言表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立师在明明知道前景不妙的心情下，爆发了对中央决策的反抗，是退无可退，铤而走险的。蔡炳臣纵容部下“炮打”，也是经过思考的暴力性抗争。

◇ 19日下午，谢、王在军区二级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周总理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王力教训军队干部要从ABC开始认识文化大革命。独立师（8201）政委、师长相继退出会议，回到师部，该师干部群情激愤，产生很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下午和午夜，部分独立师、“百万雄师”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宾馆，要找中央代表说理。据独立师干部后来揭发，王力讲话时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见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洪山下的师作战部；蔡是政工领导，牛是比蔡还要卤莽的人，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军区秘书科后来在追查事件时揭发：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军区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这段回忆说明军区机关内部在下午还未传达会议精神，会场外的值班人员并不知道内情，军区连夜传达精神，仍是钟汉华的决定）。这个情况发生在19日16时左右，8201部

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不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部队的工作，结果二人业已退出会场。又找来8201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做工作，他们对战士简单地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冲进军区的战士质问“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甚至把陈和钟叫作“投降派”。这些独立师战士也确实是消息灵通，他们已经知道陈再道在内部承认犯了错误。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那天军区师级以上的会议散得很晚，由于独立师人员堵了大门，23点，谢、王一行是从侧门，即何家垅那边的东门出去的。紧接着，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这时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大队伍还未出来，8201已经有200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深夜，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8201作战部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按这个协调组织进行的。凌晨2点，成百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8201与百万雄师开会成立“临时联合代表团”，组织与王力谈判与辩论。军区支左负责人答应调宣传车，X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揪斗（“质问”）事件极具组织性。

◇ 最先冲击东湖宾馆的人员还不是独立师的，而是“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但是他们拿着独立师派驻的军管会人员开的介绍信。在7月20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在头头何XX、萧XX、刘XX带领下，乘华沙小轿车和吉普、卡车冲击东湖客舍北门（在省博物馆边的后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拦住14人。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8201某团政治部主任王X开的介绍信，口气十分强硬，“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中央文革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他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要他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3点左右，8199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现场的8201卫兵煽动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就在相持之时，几个8201战士带枪从大院西门出去了。“武汉公安”竟然说出此话，部队内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余。

后来冲进宾馆一群百万雄师，径直进入谢、王住的百花二号，叫喊“我们要见谢富治、王力，叫他们出来”！谢与这批人到楼下后面的草坪坐下谈话，气氛已经变得较为缓和；但5点10分，8201军车21辆，宣传车6辆，3辆吉普，1辆小轿，从前、后门冲进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3辆大型救火车而来。由8201XXX副营长带队，端着冲锋枪的8201军人，枪口直接对着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首先碰到陈，战士挥枪就殴打陈再道；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被打倒在地。在场的8201部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错了”！暴徒才住手，扶起陈再道。这时已是20日早上六点左右。

◇ 另一方面，军区王科长闻讯与张昭剑商量，留下8199秘书科长滕XX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半路见好多着警服的人在院里乱窜，而一些8201的宾馆内警卫在指指点点。他们赶到百花一号后草坪，“百万雄师”与8201的人已经打人。张昭剑等赶到用身体阻拦，肋骨被打断。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中央文革张根成，北航学生尹、胡被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军区王科长忙叫来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

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说完转身就走。显然他是支持揪王力去“质问”的。

后来，谢要去救出王力，陈、钟劝谢别去，由他们亲自去处理。牛师长对陈、钟说“你们别去了，我去找他（谢）讲”，结果牛并未去谢处，也径直去军区，参加批斗王力了。

◇ 上午，在军区大院二号楼3楼46房，8201人员和百万雄师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按照计划，一个人拿起话筒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 这时现场秩序大乱，牛怀龙师长叫喊“静一下，好录音”！

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百万雄师”和部队肇事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要王力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组织的性质表态。下面满是混乱的军人、群众。

后来，还是8201一位军官（批王指挥部“的”）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回到房里后，8199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一起赶到，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军人与王力隔开，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而“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8201军人更是用枪直接指向王力。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8201的冲锋枪，卡住对方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保护了王力。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叶明副政委在指挥军区人员保护和疏散王力行动里也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他们无法控制肇事的8201战士。

◇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武装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部，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位8201的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而8201部队的人也在汽车上，手持冲锋枪向学校里开枪。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武汉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

◇ 20日14点左右，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击汉口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直冲塔台，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一个8201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机场驻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这就是现在普遍讲吴发宪谎报的事。

21日15点40分，“百万雄师”汉阳分站蔡XX带领上千人，26辆车冲击位于武昌县的山坡机场抓王力。仍然负责机场大门警卫的8201部队，出来劝说闹事群众：“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

来没有冲过。你们两天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得知机场消息，谢富治、余立金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让秘书打电话，说“你们应该撤了”。16点多，包围机场的群众撤走。看来不是所有的8201部队都赞同“质问”事件。

◇ 另一方面，据亲历者自述，张根成和两位北航红旗女同学被带走后，车上的8201军人和百万雄师也没有太为难他们，还拿车上的酸梅汤让张解渴，让女同学自己溜走了。不过张被扯掉帽徽领章游街，车上军人对他痛斥道“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古、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说明8201要控诉的并非仅仅武汉问题，他们显示了对全国形势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张根成回忆：后来游回军区附近，15点左右被带进8201师部，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文件等）”？张答“有啊”；蔡“呵”了一下，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一个干部（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就里，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怎么这样讲，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到15时左右，军区保卫处找到师部，要将张送回东湖，牛怀龙同意了。张回到东湖宾馆，谢、杨、余在场议事，张问为什么独立师干部这个样，还说什么“游泳的人、那老头子”那地方……谢说“你不知道呀，那（蔡）就是王明的警卫员！这个事就是他们搞的”！显然，谢富治和三军领导认为出现了兵变，而其中还有历史渊源。

张的这段回忆十分重要，披露了8201师团级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其话语也应当进入口述历史的研究。他们的率直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而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的已经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而谢回答的说法不知有无依据，文革时大家热中揭老底，高层政治也同样有抛历史档案打击对方的，谢是不负责任乱说，还是把蔡的老底，或是当时大家的议论？看蔡的履历，似乎与王明没有关系，问王明的秘书，他说不知道有这位警卫员。余先生说蔡1962年以后一直在师一级位置徘徊，到武汉也是从广东平调的，且说1955年的少将也有个别文革时仍是师级的。在下觉得蔡参加革命很早，使用上似有受压，可能受过党内斗争冲击。先生可从他在军区机关文革开始后，就与大军区副政委张广才过不去，向陈再道告状说张要夺军权看出：（包括谢在内的）这些鄂豫皖的老同志，也许还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呢，参加文革的年轻人历史知识多是一张白纸。

◇ 蔡炳臣（1915—1978），河南商城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73师217团排长，商城县游击队指导员、便衣队队长。主力红军转移后，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7团政治处主任，第2师4旅11团政治委员（这些经历可能与长江局的王明有短暂正常工作关系吗）。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第二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四野第40军153师政治委员。建国后任公安军的师政治委员，吉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1966年调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政治委员。武汉事件以后，被免职。1973年3月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比陈、钟后复出），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后，1978年5月被调到铁道兵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对“武汉事件”的检查和中央军委对他的处理意见，未曾流传公开。

◇ 另一方面，下午8199将王力转移到小洪山，“百万雄师”与8201战士先后用30多辆

车冲击 8 1 9 9 部队的师部（从付家坡上洪山），逼迫师机关同志交出王力。张政委等带王力到山上隐蔽。在山里周旋了一夜。山下正反复广播 8 2 0 1 的“特急呼吁”，王力听了说：“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到 2 1 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下午，8 2 0 1 冲击湖北大学，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2 0 0 余人被关押。由于怀疑王力藏在 8 1 9 9 部队，8 2 0 1 部队武力搜查 8 1 9 9 某部七连。当日“百万雄师”和 8 2 0 1 部队出动卡车约 9 0 0 余辆。后来集中整训该部，据军区调查，在武汉约有两千余名 8 2 0 1 的官兵参加事件活动。

◇ 2 1 日晚上，“百万雄师”的头头纪登清向 8 2 0 1 师部打电话，负责与其联络的郭 X X 在走廊休息，到办公室接电话，纪说“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郭说“你给我谈谈不行？”纪说不行，定要蔡政委。郭把蔡找来，蔡炳臣进入办公室竟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可见独立师引起事端，一手布置斗王力，一手还在组织夺权，试图在武汉造成继承事实。2 2 日，蔡与周忠到 6 团，对团副政委张某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 8 2 0 1 为核心”。可见，在事件的晚期，在中央召集进京前夕，蔡对形势呼还是比较乐观和政治幼稚的，8 2 0 1 的领导还热中于武汉运动的操作实际。

◇ 空 1 5 军火速进城宣布支左以后，首先控制和保护造反派集中的学校区和武汉钢铁公司，逐步从 8 2 0 1 部队手里接防一些战略制高点。在毛泽东于 7 月 2 8 日决定将 8 2 0 1 调出整训后，驻扎东湖宾馆的警卫部队才在 8 月 1 日离开原地，7 2 1 2 接防；据宾馆工作人员目击者回忆，当时宾馆的 8 2 0 1 战士都哭了，而且武器没有带走。从 7 月 2 3 日中央广播消息，到 1 5 军逐步控制武汉局势，8 2 0 1 部队撤出武汉，没有发生 8 2 0 1 部队任何基层连队与群众、空军冲突事件，也没有上街表示反抗意见。撤出过程里，已经“翻身”的造反派群众和市民，没有对“犯错误的”8 2 0 1 部队表示嘲弄奚落和驱赶。军队是完全控制着局势的，8 2 0 1 先前的躁动也得到控制（陈、钟、牛、蔡和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已经进京，武汉军区 and 独立师的控制依是有效的），群众在狂热中还保持着对军队的理智。近来，读到武汉市直机关造反派的一号头头魏某回忆 7 月 2 3 日所见：“在过长江大桥的时候，看到 8 2 0 1 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这段回忆表达的心态有典型意义，当时解放军在民众中的声誉是很高的，对 8 2 0 1 部队和军区有意见的造反派看见 8 2 0 1 战士请罪，1 8 年来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战士的惨像，心里也不好受，说明群众（特别是造反派）和军人，并没有根本的冲突与仇恨。

继造反派、武汉军区、空军在武汉三镇游行拥护中央决定，声讨“武汉事件”之后，7 月 2 8 日，8 2 0 1 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 4 0 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呼喊出“8 2 0 1 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以上 8 2 0 1 “犯事”事例，估计余先生已经收集不少历史资料，虽然难以写入军史，或许也可以对文革研究作些参考。8 2 0 1 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从层面上看，是余先生文论已经谈到的，该部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反派群众看成必须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领导主流的支持；在支左中，8 2 0 1 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更可怕的是，8 2 0 1 的干部在各个区都参与组织了 6 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 2 0 1 在支左前提下，非常深入地陷进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自发自觉地投身于抵制文革路线的行动，其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讨刚刚开始。现在的文字研究和宣传，都是高度肯定了 8 2 0 1 抵制文革的方面，不想面对他们在“武汉事件”中也是一场军队悲剧的事实。蔡政委牛师长本人，他们的一些下属，在事件中严重违反了党纪和军纪，

独立师的行为，从法制和法理上，依然是无法说通的；内蒙军区干部战士在政协礼堂闹事，抵制中央有关精神，殴打政委吴涛，周恩来就下令逮捕了肇事者。

这是我们非法制国家和非现代政治文明，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的整体悲剧。相信蔡炳臣将军在免职后的几年，包括到河南军区重新起用，陈再道邀他调他到铁道兵的几个年头，他内心仍然是郁闷的。他没有看到中央给“武汉事件”平反。

余先生并未披露 8 2 0 1 整训的系统材料。1 9 6 8 年重新组建 1 7 军时，我在武汉军区的 8 2 2 1 部队（独立炮团，驻河南平顶山），该团成建制调到沙市，并入 1 7 军序列；听说将与原 8 2 0 1 的部队为伍，倒很希望结识一些“武汉事件”时的当事人，知晓些内幕。但笔者所在学生连队转入 8 2 1 2 部队的侦察营管理，未与 8 2 2 1 去沙市；碰巧在平顶山的 8 2 1 2 第 1 9 分队，有不少武汉军区和空司的子弟，包括孔庆德的闺女，她是卫校毕业的，据说也是造反派，6 7 年春孔司令曾抓了她，隔离保护起来了，6 8 年是营卫生室的医生。一些喜欢侃大山的军队子弟，也谈到 8 2 0 1 的一些团、营级干部，在整训后工作有交流变动，有的提前转业了。相信许多战士和干部的正常使用受到影响。他们的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家属，思想倾向于“百万雄师”，一度受到一些打击与歧视。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该部官兵的任何音讯，特别是他们心中究竟在想什么。他们没有在社会上留下自己对事件的整个说法。他们毕竟做过一场悲剧的舞台演员。

~~~~~

#### 【史实探微】

1 9 6 7 年“武汉事件”——是谁透露了“四点指示”？

• 诸葛壶口 •

最近在网上读到署名为欧阳龙门撰写的《是谁引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见本刊 z k 0 5 0 2 a ——编者），在该文开始，就点出引发武汉倾向百万雄师的独立师反弹的“四点指示”——“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注释 1，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按：内容在该书 2 6 2 页，引文与原文略有差别）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 1 9 6 7 年 7 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包括了江青，达成的一致意见。有关这一点，陈再道是明白的，同时也是刻意回避的。现在流行的说法则有意说成只是中央文革或者王力个人的意思（注释 1、2、3、4，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权延赤：《杨成武见证文革》，董保存：《政治漩涡中杨成武》）这是讲不通的。”以上注释的原文的确是近十多年来，在文革史论中较先提出“四点指示”问题，且引导反思文革视听，不过并非每一注释原文都直接谈及“四点指示”了。

欧阳先生接着较为公允地写道：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谢富治和王力到造反派一方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向保守派发起挑衅。保守派则因此被激怒而冲击东湖宾馆要揪斗王力，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这里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是：1）周恩来传达四点指示在前，谢富治和王力公布四点指示在后。尽管周恩来是在武汉军区的干部会上传达的，谢富治和王力是在会见造反派的时候公布的，其结果都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2）



四点指示并不是谢富治、王力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央的决定”。

欧阳先生并不要为王力辩护，只是希望公正地分析引发事件的根本原因，对时下流行的说法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也承认是谢富治、王力公开了中共中央的四点指示。

情况究竟如何？看来重新回顾一下当年一些实情，依然有必要。

1. 1967年7月18日下午，周恩来的讲话最主要的四点精神的确大致如此，还展开讲了八点：“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7月25日，周总理接见河南军队干部，就谈到：“……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可见，四点和八点，周恩来都承担责任。他是在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以上会议上说的，会议宣布纪律，不作传达。

2. 7月18日（实际上是19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四点的精神。他讲到：“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的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决！（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按：实际上是钢二司司令部），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一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的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声呼口号）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3. 王力接着谢富治讲话，全部内容也没有传达四点指示；但是王力以他特有的左派激进文人的情感，公开地表态支持武汉的造反派，为了科学地反思历史，公正地分析王力本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们将当时的录音整理文字，全文附后。

这个讲话，突出了几个精神：1）坚决支持造反派——“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同志们！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2）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3）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4）正确对待解放军——“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

从以上四个要点看，王力在群众中的讲话没有直接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但精神大意与中央地四点精神是吻合的。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些讲话精神是正确的，公正地说，这些讲话主观上是引导造反派群众正确处理一些关系，并不属于挑动群众斗群众。尽管这些讲话比谢富治的要锋芒毕露得多。

所以中纪委在审查王力时，并没有就他在武汉的这些讲话去追究他的责任。

4. 7月19日下午，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到军区要求谢富治澄清问题，在军区机关大院和社会上公开提出四点指示问题。

17日到19日，“百万雄师”的大标语逐渐上街，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以及“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并且出现“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的“最新最高指示”。但是，绝大多数百万雄师群众并不知道四点指示内容。在19日白天，在街上尚未见到直接提出和抨击四点指示的标语，可见，是独立师最先提出对指示有疑义，而非百万雄师；其次，不论是独立师中下层干部、指战员还是百万雄师，都还是不愿意相信中央会有这种指示，而要求澄清事实，他们下午到军区造反时，未采取暴力行动，也没有公开贴大字报和标语，而是文革时兴的，要求接见回答问题。

事后，武汉军区秘书科披露：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同时，独立师的战士到军区政治部值班室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在场军区机关值班同志都未参加会议，还不知道王力传达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基层连队指战员知道那么早？在军区造反的人员，提出要求谢澄清事实，当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5. 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为泄露周恩来讲问题承担过责任。钟汉华后来在检查中承认：“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独立师政委）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这个检查是在“武汉事件”以后批判的高压下做的，措辞未必准确；但后来钟汉华并未公开否定它，没有为自己公开表白，说明他始终明白自己应该承担部分违反党纪、军纪的责任。

6. 独立师在18、19日情况。周恩来18日的讲话，被独立师政委连夜传达到团以上的干部，蔡在传达中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传达会议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上扬。牛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面对干部的不满，蔡、牛要求“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加之是王力在19日军区会议上再次传达四点指示，所以，在对下传达和对外宣传鼓动时，独立师的质问都针对了谢、王，没有提到总理。

19日上午，独立师又将精神传达到排以上的干部，并把独立师派驻武汉各单位的军代表叫回来听了传达，并要求军代表传达给群众组织。因为独立师与百万雄师关系十分密切，当日，通过派驻各区、百万雄师联络分站和大单位的支左军人或军代表，有关精神迅速传到百万雄师各级组织；百万雄师上、中层讨论了形势与对策。

19日下午，王力讲话时8201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蔡政委气冲冲离开会场，牛相继退出。他们回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工作。后来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由于大门被堵，谢、王一行23时后从军区边门离开大院。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8201已经有200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说：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另方面，武昌公安局多人开始冲击东湖宾馆北门，要求见谢富治。这样，追问和质问四点指示，才开始成为群体性的骚动。

7. 王力是否通过北航红旗学生向武汉造反派泄露了精神？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里说王力在1

7、19日两次把毛主席在汉谈话记录给北航红旗的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而且卖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进行煽风点火，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陈再道这些话的根据不知是什么，他在什么时候参与审查过王力和北航红卫兵呢？替他执笔写回忆录的后生是否见过审查王力一干人的记录？而且在17日到19日，北航随谢富治、王力到汉的红卫兵，没有任何时间和机会，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或私下与武汉造反派通气，泄露中央的方针；尽管他们当时在思想上倾向于武汉造反派，但是当时依然有纪律规定，他们不能自己向地方群众透露中央指示精神。至于北航原驻汉联络站学生，始终与武汉学生有频频的形势分析，但他们也不知道东湖里和军区上层所传达的毛、周的精神（当时这些全部是保密的），所以不存在王力通过北航学生透露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造反派而言，没有任何人向他们传达四点指示，他们到百万雄师上街，才知道大概提法。他们在19日上街了，宣传的仅是拥护谢、王在凌晨的讲话，没有什么四点指示。所以四点指示的透露，实际是湖北军区独立师（8221部队）从18日开始逐级正式传达，19日上午传达到排级，下午到士兵，同日传到百万雄师头头和群众中。

◇ 附：王力讲话（1967年7月19日凌晨3时）：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們，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众口号声）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作扫开的手势，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笑，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

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根据水院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读史札记】

读《微行》一书存疑

• 书生意气 •

1990年代以来，文革历史纪实、回忆，渐成气候。其中得以采访文革风云人物，记录中共高层文革政治活动，洋洋洒洒，捭阖纵横，渐成大观者，南有叶永烈，北有权延赤。二者比之其他人，率先披露许多未为人知的上层斗争细微末节、内部消息，一时也独领文革纪实文学风骚，一些重大历史情节与论说，被正史、野说和演义一引再引，人云亦云。对于文革这十分敏感，慎之又慎的写作、出版，惟独叶、权所向披靡，学者文人论及历史，也常常引证叶、权提供史实和人物话语；“南叶北权”似乎可以成为文革研究。

我在90年代读了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为该书披露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共领袖人物言谈、决策事实所感染，以为历史就是如此的了，特别是杨成武将军（他为该书提供主要回忆素材；也是我自阅读《红旗飘飘》以来就十分崇敬的共和国将军），在其他场合也通过口述记录形式，让其他作者撰写了类似的史实题材的作品，它们包括了杨的回忆、毛的话语，加上作者文字演绎，历史与演义混为一体，我都以为是历史事实了。而许多研究文论、文学作品乃至戏说演义、街头巷尾报刊读物，涉及武汉事件，也从杨将军公诸于世的毛泽东、林彪——其他军政领导的言行、内心描述，一引再引，辗转复制、演绎。

但一些关键、细节和地方，总是有些疑问，久久不明，需要求教大家：

1. 第一版《微行》的第5—9页，记录、演绎了毛泽东读《通鉴》，而且就在宣布决定南下武汉的1967年7月13日，毛正在读《通鉴》，卷七，秦始皇听卢生讲微行以避恶鬼，卷十一，陈平建议汉高帝“伪游云梦”，待图谋反叛的韩信“谒而陛下因禽之”，高帝以为然，遂南行陈县擒韩。权文说（毛泽东）当时正盘算，“现在谁是谋反的‘韩信’”？众老帅不会是，青海赵永夫、内蒙军区的“骄兵悍将”、云南赵健民？“毛泽东摇摇头，心有疑惑……结论不忙下。何况，这些地方成不了大气候”。但毛“目光停在‘吾将南游云梦’，久久不移”。“陈再道将兵数十万，为一路诸侯，成一方气候”。加之，林彪说对北京、武汉军区不放心，中央文革说陈“是武汉的谭震林”。毛“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他不相信。但也不放心”。作者云他访问了毛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孟提供的证明是毛重视读《通鉴》，就在南巡武汉前夕他正在读权文所说的卷七、卷十一。毛泽东是借读史运作文革实政？权文语焉不详。但权文首次在国人前演绎了一大段毛泽东似不光明的心理活动，毛泽东似乎用谋反的韩信“借古喻今”来怀疑陈再道司令员，或许是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倾向影响了毛？是他就从古史经验来搜寻需要整肃的将帅？况且，权文在第12—13页，引用孟护士在90年代初回忆的毛泽东的话，说秦始皇以为焚书坑儒就天下太平，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似乎，文革从文化教育界开始，现在更要考虑的是粗人军人造反了。权的演绎和毛的思想，那一个更符合客观真实？

笔者绝对相信权同志红旗下出生、长大，他完全是拥护热爱毛泽东的，不会在毛泽东身后毫无根据地来揣测与污蔑伟大领袖。笔者也绝对相信孟护士尊敬毛泽东，决不会在毛身后无中生有；而杨将军对于这段文字，虽无口述的义务和责任，但对这本书不会不认真地考虑和斟酌，因为这书叙述记录了他居于中共顶峰的风云活动，可能是他一生最风光的几个月！不讲对中共政治历史负责，至少要对他自己负责。那末，他似乎也以当事人身份，同意权的分析，或者旁证了当年毛南下武汉的全部动机、心理。相信其他的读者也是这样，大多信赖了权延赤的披露分析不是演义，而是信史。

这样来看，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似乎毛泽东比林彪和江青更明确地要收拾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他的理由是什么，是时下批判毛的——他根据封建帝王的历史经验，要收取打江山功臣的权力，良弓藏走狗烹？是陈将军确有反叛之意或真有什么重大不忠问题？还是仅仅陈再道对他的文革意图很不理解和抵制？而该书的主体倾向，又认为林彪、江青阴谋策划了“武汉事件”。国内近30年来的官方主流倾向，是林、江合谋制造了“武汉事件”。所以该书的两种意向是完全冲突的。进而，这与权同志肯定毛的文革初衷，权记录毛对杨成武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了”又如何衔接？杨成武认为王力等文革要员理解“当局了”为重点解决军队问题，抓军内一小撮；而认为毛泽东是要稳定军队、依靠军队稳定全国的意思。

疑问在于：权文大量表述了毛泽东的思考（实例不一一列举），反映的是否毛泽东的真实原意？是毛泽东当时如此去思想的还是权同志臆断猜测的？既然说陈司令是无辜的，毛泽东去武

汉是为了保护他过关，为何毛泽东南下又要提防韩信一类的人物？以上回忆和分析能否作为信史的参考？本人这里撇开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价值判断，仅仅是确认：是不是，有没有？对于武汉事件的这些重大背景的是与不是，《微行》语焉不详。

2. 关于军委十条命令的出台。权文说：“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第18页）这样表述，是否准确？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所披露，毛泽东在1967年4月4日就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作了批语，并对第一、三、四、六、七条等内容亲自做了文字修改，4月6日，又对林彪送审的修改稿做批语。两次批语先后指出印发军区会议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该文件草稿的确是林彪口述，书记记录起草，送关锋斟酌，关、王、戚商量、修改，林送毛泽东审阅。问题是文稿送到毛泽东，毛和中央其他领导，根据当时在军队介入文革运动中实际出现的情况和他们的认识，反复研讨了此文稿，毛泽东做过认真修改，文件又印发提供军队同志征求意见。就如大家之说，文革期间政党运作决策程序再怎么不正常，但该文件的出台，过程与手续本身还是比较正规和完善的。权文将十条出台归咎于林彪和关、戚，再将前述八条和此十条完全对立起来，是否历史、科学？曾热中于制订八条感谢毛泽东批准八条的林彪，后来为何又主动提出十条，如果林彪草文售奸以“乱军”，毛泽东为何会支持他？作为武汉问题的一个前期背景，作者没有真正说明。

3. 关于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林彪对陈再道、钟汉华下逐客令问题。第19—20页说，林彪“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唯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实际上1967年庆祝五一节，涉及许多老同志的待遇问题，所以毛泽东提前半月就委托周恩来筹备有关事宜，确定参加活动、不上天安门问题，周亲自组织有关活动，给老同志和造反派群众做工作。整个安排，是周恩来在总理之中。林彪在文革中许多大事也不了了之，何以就什么军队领导人去留（北京）做具体指示？林彪下逐客令之说有何根据？况且，萧华、杨成武当年是周恩来处理军队事宜的左右手，在五一前，萧上将早已成为扶不起来的天子，自身命运难保，唯一可以帮助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包括进退、上下、出入）者，惟杨上将也。如果是周不同意武汉军区领导留下参加活动，太不符合实际，他也不会就一个司令员出此惩戒办法；而当时研究确定军方问题，周恩来又要听杨上将意见，他是当时最知情的人。可以参考的事实是，五一晚宴之后的大厅里，三军、三总部、大军区众将军簇拥着微醉自得的杨代总长，如众星拱月；杨应该最知晓诸将中为何没有陈再道的底细。似乎杨没有口述给权延赤明确的史实，或者默认他成文来谴责林彪——对陈司令下逐客令。当时提议和决定武汉军区领导不予参加五一活动的，究竟是什么重大人物？他为何对陈再道态度如此苛刻？从权的文字顺序，似乎是江青4月对武汉军区雷霆震怒直接联系着林彪的逐客，两者有因果关系而且是历史必然吗？即便源出江青，具体是谁去照办的呢？

4. 7月14日杨成武抵达武汉情景。该书第60—61页，讲杨成武带着“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吗？’”复杂的心情，将毛泽东送到武汉东湖梅岭一号，顾不得休息，直奔周恩来住地“百花一号”，杨向总理敬礼，汇报“主席已经安全到达”。笔者最近读到另一回忆，是当年随谢、王在14日中午已经到达武汉的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的回忆。张说：“晚上，总理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东湖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是郑维山……张报告汪东兴到了，总理出来问汪：‘到了’？（按：指毛泽东到达了）汪东兴答‘到了’。周随即宣布散会，夹起皮包就去毛主席驻地”。从张的回忆，是汪东兴与毛泽东抵达之后，去总理住处，总理得知毛泽东“到了”，立即就去毛泽东住地。究竟是杨先见周，还是汪先去周恩来处？

接着，是权文引用的杨的回忆，说周恩来先听杨汇报路上情况，并未谈到周去毛泽东处。

特别是从杨看来，周“眉头微微一皱……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讲述谢、王、余也到了武汉。杨听后一怔：“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过来……”。周解释，谢是他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而“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既然如此，杨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问周恩来“他来干什么”？这段记载，给读者留下事后孔明似地过分渲染周恩来与杨本人实际情绪的印象。联想起杨成武在1967年7月14日见王力之前已经担心中央文革会闹事的预感，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事后的附会——甚至是口述整理者自己的附会？杨成武在当时，与中央文革工作配合得并不错，对江青也是十分尊重和推崇的，他凭什么担心中央文革要闹事，又直接对周恩来质问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干什么？周恩来凭什么说王力打了电话“也要来武汉”？从武汉事件之前情况看，周恩来毫无必要也没有根据，在杨成武面前过分表示对中央文革的忧虑，更不会无中生有说王力自己要求到武汉。因为召谢富治到汉，电话是周打的，谢请示在重庆的其他人如何办，周要求一起到武汉，他何苦在杨前面去演示自己对王力有反感？作为参考，也不妨看看与此有关的张根成的回忆：“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一行先去云南，临行，总理还专门安排就住在昆明军用机场。6月底出行时，就没有去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去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富治、王力并没有携带与武汉问题有关的文件材料。一行人大约是7月5日左右到成都的，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王力与众人议论刚到重庆，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又要赶到武汉？谢、王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关锋接电，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据张回忆，当时王力并非赖着要跟到武汉（大家并不知道是什么任务），甚至还想留在重庆处理事宜，所以叫张打电话询问。实际上，王力自己并未与周恩来打电话。今天平心静气来看，周恩来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完全没有必要对自己部下的谢、王一行反感，以至去编造王力自己要求到汉的话，杨成武在当时并不知道毛、周的全部安排，也没有必要声明自己在7月14日就反感王力的来到，似乎已经预感王力要出纰漏。

那末，这段文字，是杨将军把后来自己的想法转移到1967年了呢，还是口述的记录整理者的话语导向呢？特别是，待罪之王力，就此问题还写有回忆录，也给中纪委写有申述（笔者不引证他的有关自白），对于当年的事情，是王力在撒谎洗刷自己责任，还是杨将军或权记者说过了头？

5. 其他几个具体问题。

（1）第85—86页，说谢富治在7月19日早饭后“一脸惶威”找杨成武倾诉到水利学院看造反派以后，（他们）又闹起来了。这段文字可能记载的不是历史事实。谢、王一行的确在送走周恩来后，到水利学院去亮相表态了。他们回到东湖躺下休息已经是19日凌晨快4点了。聚集在水利学院被谢接见的造反派也总得歇息片刻，他们除了欢呼“毛主席派来的人和解放军”，除了有人（省直造反派）将谢、王讲话录音在天明以后拿出去播放，大概是没有“闹起来”的。上午，武汉三镇多处播放谢、王录音，两派并未冲突。在19日早饭前后，迄至午饭前后，武汉的造反派、百万雄师都没有闹，他们在考虑对于中央首长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谢何来的惶恐？谢是自以为正确的，他在19日晨惶恐什么？谢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杨是代总长，而且当时的分工，杨将军与三军领导主要保护毛泽东安全，没有参与做两派群众工作；谢、王要面对群众做工作，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凭什么去找杨成武倾诉自己可能在群众工作中闯祸了？谢、王初知情况不妙，已经是19日下午，那时他们在军区会议室讲话教育教训军区师级领导干部，军区大院外有省直造反派在播放谢、王在水院的录音，大院内有一群独立师的战士起哄，要求澄清所谓“四点指示”。这些情况被工作人员得知，汇报给他们，但他们根本没有当一回事，王力还反问“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谢富治在会议中与会议后也困倦去休息了，没有多少恐慌不安。所以杨成武在19日早饭后警告，谢富治王力“几句话”就把总理的努力破坏了，“我看你们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大致不是当时事实，而是后来的心态，

或向权记者口述时的心态。

(2)第92—93页,说谢富治在7月20日早饭之后(“日上三竿”),又匆匆向杨倾诉“出事了”。谢说“韩爱晶、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这点十分令人困惑:韩、谭二人,根本没有到武汉,就谈不到被百万雄师拥走的事实。谢带到云南、四川重庆,又到武汉的红卫兵,是北航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他们相处二十多日,谢起码不会把姓名弄错。对杨来说,当年是真心实意相信毛泽东和江青,支持红卫兵造反的军委领导同志,北航红旗自认为有杨将军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杨与北航红旗有较为密切来往,还参加北航革命委员会成立活动,他早就认识韩爱晶与井岗山(一、二号头头)。井岗山与他在东湖百花院相处数日,“720”出事时还在他与谢富治之间奔走联络(井去杨处,杨、余、李作鹏和三军作战部领导议论从各处调兵赶来武汉事宜,并不避井;井见情势,自行离开百花一号),他怎么会弄错人?特别是北师大的谭厚兰,更是不沾边,杨成武当时正当壮年,怎么可能把两个学校的人物弄错?如果说杨在口述时年事已高,可能把学生姓名说混,为何还谈不到年事已高的权记者,会出这种“不硬不软”的“笔误”?如果是1967年才几岁的人,未经历文革实践,仅仅从文字材料看文革,有可能张冠李戴;作为研究者也不会不询问当事人,多少总得做点考证。口述历史不是评书演义,时间、地点、人物、言行都得基本准确。权记者是当年北京的大学红卫兵,多少也是见过场面的头头,又在论说文革,不会不连北航、师大的学生头头姓名都不清楚,为什么出现这种属于硬伤的“笔误”呢?谢将军紧张了说错嘴,杨将军年龄大了说错嘴,读者都可以原谅。但亲历文革的一代人,且做过文字斟酌,就很难令人明白一个小地方可以如此张冠李戴,那论说中央高层领导人物、言行的文字,准确性与置信度会如何呢?

更值得强调的是:是否杨真是到“日上三竿”才知道出事了?联系史料,并参考当事人之一的张根成回忆,20日凌晨1点多,汪东兴急电百花二号,说有人在冲击宾馆北门(靠近毛泽东所在的梅岭),张去现场观察并见军区保卫科科长劝阻来人,汪就在附近密切观察(8341指战员已经作了应急准备);张回去报告王力,马上通知军区值班领导,叶副政委答应派40名干部来加强工作;三点许,29师张政委率部赶到。此前,汪再催“不行啊,怎么没有见增加人啊”。王力忙叫叫醒谢,谢边穿衣服,边说赶快把宾馆造反派头头叫来,先将内部造反派稳定住,叫大家不要乱,免得群众发生冲突。时天已蒙蒙亮,院子里已经有人冲进来了。王力叫张快去通知住百花一号的杨成武,张从后门跑到一号(两楼相距约200米),杨起身说:“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按原来决定,杨被要求不要暴露身份,张说“主席那边汪东兴知道;你不要暴露”,杨道“那我们就不出去了”。很快人群冲进二号楼上,大叫“谁是谢富治”?从时间发生顺序看,张是在天已经蒙蒙亮,百花院已经冲进“百万雄师”时去通知杨成武的,杨怎么不知道院子里出现情况?四点多,武汉军区领导被叫到现场,五点多,谢富治与来人在二号楼后面草坪进行交谈与交涉,情况略有缓和(草坪正对一号楼,杨的住室在楼上);六点前,从西门(靠近百花院落)冲进31车持枪的独立师军人(其中军用卡车21辆),气氛紧张起来,开始打人抓人。抓人时,院子里已经人声喧哗,一号楼的警卫、领导,连服务员都会知道情况不妙,何况是职业军人?保护毛泽东安全是杨为此为大的任务,将军首先想到的是“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即便不叫他去暴露身份,他可能在张根成报信后再安然入睡吗?他与汪、谢不会电话联络吗?他会从天蒙蒙亮到“日上三竿”还能心平气和,端坐用餐吗?谢、杨在上午当然是当面交换与商量过情况,当时住在百花一号的三军、机要同志,健在者还有好多位,他们的记忆会是什么?是否将军把当时情景遗忘?

(3)第106—107页,杨成武上将在汉口机场调飞机问题。文云杨成武护送毛泽东到汉口机场,“机场并不象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读者弄不清楚,是否吴司令谎报军情——而且是在毛泽东将转移的时候?事实真相是,20日下午,闻讯周总理要到,的确有数十车群众和军人冲进汉口军用机场,要求见周,有的卡车甚至停在跑道上。劝阻之同时,机场同志报告武汉空军司令部,武空报告军委的空司吴法宪,北

京通知周的专机在武昌山坡着陆；汉口机场的人群后来也就散去，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武汉军区的孔庆德副司令、空军刘丰副司令亲自安排、警卫毛泽东转移汉口机场事宜；机场情况自然是武汉的人最清楚，北京的吴司令来报告什么？机场当然是无外人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也总得睡觉。这里是否将20日下午的事“粘贴”到21日凌晨了？

另一方面，周恩来亲自指挥空军政委余立金，专门落实毛泽东飞离武汉事宜，余在毛泽东抵达机场前后，已经和正在落实毛泽东的专机与护卫飞机（他到武汉主要任务也就是此事）。权文说杨成武亲自去落实飞机，而且专机师的大队长并不知晓杨焦急的一切，冒出来最好的飞机是谢富治要用的怪论（王进忠此前未见杨成武，总知晓周恩来、余立金有交代吧，专机是统一安排调用的，怎么会成为个人专机，专为中央首长服务的王团长，何能出此幼稚之言）。甚至，在杨以总参谋长身份教训一个专机师大队长同时，毛泽东本人就已走过来，杨汇报主席，“我们就要坐这架飞机”！在权延赤笔下，详细介绍了专机调动的程序，但总参谋长却像临时在总指挥一场儿戏。不知道饱经风霜的专机师和王大队长如何看待这段记载？

“720事件”专机组的回忆文稿说：周恩来20日到达山坡机场，对专机要求：“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已经通知，晚饭送到飞机上来，”……随后机组接到命令，3架伊尔-18飞机立即飞至王家墩机场。……后来，空军政委的秘书向机组传达命令：“机组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就在机场招待所和衣而眠，迷糊了一觉。21日凌晨4点……命令下达：“准备马上起飞！”……上午9点钟余立金来到机场，径直登上王团长驾驶的那架飞机，当发现飞机上全是座位没有包间也没有床位的时候又急忙离开这架飞机，朝着副团长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跑去（按：余立金使用232号后不久）……此刻，毛泽东乘坐的小车来到机场，正在待命的潘景寅看到之后手足无措，忙不迭地跑到王团长身边报告，然后回到自己驾驶的232号飞机上，紧接着毛泽东登上了232号飞机。回忆稿说是空军政委余立金亲临现场组织指挥飞行任务的。

辑有此次飞行回忆（王进忠大队长）的《绝密飞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说：（天黑后，专机从山坡起飞在王家墩着陆，见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的专机）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凌晨4点，（飞行员）房门被人推开……“准备马上起飞”，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232号专机机长潘景寅匆匆走来）说：“主……主席……毛主席来了”！（按：此时潘已经得知是毛泽东要用飞机，专机组才知道周恩来给他们的使命）……毛泽东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上了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领航员……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到虹桥机场”！

可见，在专机师的回忆里，空军领导（政委、秘书、作战部部长）是现场安排飞行任务的关键人物，不是事必躬亲的代总长。权的记录起飞前的回忆文字里没有余，仅仅是到上海以后，毛泽东要杨去布置，指派空军政委余立金与作战部副部长飞返武汉，试问，空军领导何时到的上海？怎么冒出来的？而且，权文说杨安排好一切，十多架飞机升上武汉的夜空，在21日11时到达上海。武汉七月的夜空，至少是凌晨五点以前，武汉到上海仅需1小时多一点，还有四个多小时，载有伟大领袖的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翱翔盘旋了？这个说法也与专机师说的——9点钟余立金与毛泽东才来到机场很不一致。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